

三十年来中国

——From MarxLeninism to MarketLeninism

朱学勤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大转折究竟“好”得很，还是好个“屁”？

¹朝野上下争了30年。辩论发生过三次，1978年胡耀邦主持真理标准大讨论是第一次，1992年围绕邓小平南巡发生姓“社”还是姓“资”争论是第二次，当下再辩，已经是第三次。目前态势是：“好”派在官方主流话语中占优势，“屁”派在民间互联网上有人气。从发展眼光看，民情、民意正在向“屁”派转移，形势对“好”派不利。²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两边在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但仔细分辨，会发现激辩双方其实是在共享同一个逻辑前提，都认为三十年来中国只有一场改革，而且贯穿始终，只是一方说“好”，一方说“屁”。问题或许就在这一“前提”本身：三十年来只有一场改革吗？改革是否发生过断裂，在断裂的这一边与那一边，是否发生有貌合神离的两场改革？“好”派与“屁”派辩论30年改革的性质，却同时背离30年来中国最为重大的一场事件——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能否说通？

本文从这一问题出发，试图说明好派、屁派共有的逻辑前提难以成立，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具有分水岭性质，在此之前有第一场改革，在此之后又有第二场改革；三十年来中国，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是中国确实发生了改革，但改革是两场，不是一场；两场改革貌合神离，前一场改革因事变而失败，甚至被埋葬；后一场改革是在前者被埋葬的坟场上翩翩起舞，延续至今；今日中国，“好”也罢，“屁”也罢，更多的是与第二场改革相关，而不是与第一场改革相连。

文革与改革：一字之隔

三十年前的改革是被文革逼出来的。文革与改革一字之隔，天翻地覆。文革不能仅仅归咎于四人帮，也不能仅仅归咎于四人帮后面有晚年毛泽东的支持，它是更大范围、更长时段激进革命运动的最后阶段。从1789年法国革命到1989年苏东崩溃，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历史单元，整整两百年。法国革命从1789年开始，日趋激进，人人自危，至1794年的7月24日，国民公会内发生“热月”事变，雅克宾派专政戛然而止，热月党人开启社会还俗大潮。用邓小平允诺1997年香港回归基本生活方式不变的语言来说，所谓“社会大还俗”，即指革命激情过后，社会回复世俗生态——“马照跑，舞照跳，股票照样炒”。这一从广场到厨房、从革命激情到世俗物欲的标志性事件，在法国是1974年热月事变，在中国是1976年10月6日“怀仁堂事变”，后者只不过是“中国版的“热月事变”。

无论世界上有多少个语种的“热月事变”，都不会改变此类事变的基本性质：是以政变的方式突然打断政变起家的过激派统治，由此孕育革命结束之后的“改革”阶段。“改革”从这里获得历史起点，同时也承继此后可能被政变再次打断的历史性基因。“热月事变”之后，法国政局的反复动荡说明了这一点，“怀仁堂事变”之后，“改革”发生断裂，也证明了这一点。只是在中国，由于“怀仁堂事变”的发起者如汪东兴等没有起码的历史自觉，无意中触动历史的道岔，却又在时代列车经过这一拐点转向另一方向时，在列车的后方徒然呼喊

¹ 此处“好”、“屁”两分，在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是个约定俗成的分野，前者为肯定派，后者为否定派。此粗野不文之说，最早起源于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6年），此后在文化革命中全国各省市两大派内战时被大规模复制，改革开放年月又在网络语言中复活，可谓后现代电子版。

² 据2008年8月凤凰网网络调查，在11343人中，赞成改革的仅占29.5%，为3346人；而反对改革的占70.5%，即7997人。

两个“凡是”，与世界史上同类“热月事变”相比，落下了格外粗鄙的笑柄。不容忽视的是，“怀仁堂事变”的实施者，在事变之后延续被颠覆者的思想路线——没有四人帮的四人帮路线，长达两年之久，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决议”，也只限于在权力更替与政治层面上否定文革，并未触动文革得以发生的制度基础。文革以文革方式结束，它仅仅是在政治上被解散，而不是在制度层面被铲除，其发生根基并没有改变。此后所谓“改革开放新时期”，身后拖有文革的浓长阴影，文革与改革如影随行，颠覆者被颠覆，改革随时都会被身后阴影扑倒，甚至最终被打断。

第一场改革：文革不能再发生了

1978至1989是中国的第一场改革。历史的天幕上有一行字，隐约昭示人间中国这场改革的总背景，那一行字当然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而不是其它词句。

毛泽东去世时天怨人怒，尤其是官员与知识分子阶层。十年文革是“官不聊生”的十年，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随时有突然打倒的羞辱，由此积聚改变政局的第一动力。知识分子提供第二动力，这个阶层迫切希望能恢复知识尊严，恢复中国社会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第一动力从政治上推动文革到改革，知识阶层则提供这一变动的合法性解释。第一场改革是在“解散文革”这个大旗下召集起他的核心同盟，改革派官员与知识分子第一次握手。这一动力结构与此后第二场改革迥然有异，后者是政府与资本握手。至于人数最多的底层民众尤其是深受人民公社体制压迫的农民，在第一场改革中是受益者，在第二场改革中则成为受害者。城市工人阶层，相对农民，他们是计划经济的得益者，第一场改革的旁观者；相对政府官员与新兴资本家阶层，他们在第二场改革中，社会地位迅速沦落，从旁观者变为被剥夺者。

在上述背景的刺激下，第一场改革的目标是双重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并重，按照邓小平本人当时的说法，政治体制改革将决定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而不是相反。但在第二场改革中，政治体制改革处于被取消状态，经济体制改革在缺乏前者保障下，走上了权贵资本主义的歧途；两者关系也发生置换，官场普遍流行这一逻辑：以经济体制改革的所谓“成功”来证明政治体制改革可有可无。

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1989年，可谓一个古老民族的返老还童。在单个人身上，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返老还童，但在一个民族身上，我们确实看到了返老还童的短暂奇迹。文革不仅是在物质上，更重要的是毁灭一个民族的精神。在红海洋的颠狂表象下，是政治恐怖的阴影，每一个家庭都有受害者，每一个人的内心都留有政治阴霾。就是那样一个气血衰沉的民族，突然迎来了一个青春浪漫岁月，每一个人好像都年轻了十岁，返老还童。我们都记得那个岁月：大学教室里老教授白发苍苍，憋了十年劲，滔滔不绝，讲台下的学生是三十岁以上的老三届拖家带口，十八、九岁半大孩子是应届高中生，两代人共聚一堂，嗷嗷待哺。那时某一个图书馆说，明天早上我们增发阅览证50张、100张，门口半夜就排起长龙；新华书店突然说明天发行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小说，长龙又会在书店门口出现；电影院播放禁演十七年的老电影，哪怕是“洪湖水，浪打浪”，长龙则在售票处出现。民族突然变得年轻起来，流行歌曲是“祝酒歌”、“八十年代新一辈”，全社会都洋溢着乐观情绪，如果要寻找一个背景音乐，最好的旋律就是城乡共鸣、老少皆宜的那首《在希望的田野上》，合唱、独唱皆相宜。那是一段枯木逢春的青春浪漫，关键在于这个党、这个民族的幸运，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黄金内阁——邓、胡、赵三架马车。在这个民族的人治阶段，少数领导人的政策取向，要比民主制度下千百万人的民心、民意更有力量来决定这个社会的基本面貌。

邓在当时的独特作用，没有理由受到质疑。可以举一个例子。三中全会上曾经有人提议陈云出来掌舵，这是因为当时邓小平正处在局外人向局内逐渐回归的半途，此其一。其二，三中全会说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大家公认党内懂经济的人是陈云，而不是其他人。这两个因素放在那里，部分元老一度希望是陈云出来掌舵，顺理成章。但是陈云表态说，从经济建设方面来说，我确实够格，可以掌这个舵，但是这么大的党、这么大的国家，总要有一个领过兵、带过军队、打过仗的人出来掌舵，我什么都不缺，就缺后面这一条。如果是按照后一条来找掌舵人，那当然是邓小平。只有他才能调动铁血洪流，也只有他具备钢铁般的政治意志。十年后，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民族的幸运是百官凋零，居然还剩下一个邓；邓的幸运在于他的左膀右臂，他选对了人——胡耀邦有火焰般的激情，赵紫阳有冰雪般的聪明，这是天作之合。胡耀邦的作用在哪里？

他提供了一个民族焕发青春激情最需要的道德魅力、人格魅力。从七十到八十年代，中国社会满目疮痍，人的精神世界受到巨大伤害，党内老干部从一场接一场的左倾运动中走出，每一个人都整过人，也被人整，每一个人的内心都留有政治暗疾。唯独胡耀邦是异数，是一个罕见的阳光型政治家。他好象没有经历过这些运动，满身透明，用今天的话来说几乎是一个“阳光青年”。当然他也吃亏在这一点，伟大的事业总需要一点天真。那样的人在那个时代出现，是把这个党、这个民族所剩无几的道德残余凝聚起来，是道德残余，不是道德资源。从文革走向改革，没有这样的一个人，这个社会凝聚不起来，这个民族凝聚不起来。如果我们要寻找那一年代社会面貌的人格烙印，能否找到第二个人？非胡耀邦莫属。

第一场改革之隐患

第一个隐患，它的动力更多来自于开明派官员和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掀起观念风暴，与千百万民众尤其是城市居民的具体利益即使有结合，结合也不紧密。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是半悬在空中，和千百万民众的利益脱节，很容易被打退，更容易被武器的批判打得粉碎。

这一缺陷受制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反复与曲折。当时，经济体制的改革趋向是摆脱计划经济，但是非计划经济的模式是什么，并不清楚，左右摇摆，前后徘徊。检索党的语言，开始说是学匈牙利模式，后来说学新加坡模式，再后来一步步靠近新经济模式，每一次靠近，都是绕来绕去的绕口令，从“公有制前提下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到“政府制订计划、计划指导市场、市场影响企业”，等等。有四个字呼之不出、呼之欲出，这四个字到九十年代方家喻户晓，那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字始终没有堂堂正正出现在党的纲领性文件上。

第二个隐患，则来自更为凶险的政治层面。第一场改革否定了文革，改变的是政策，而且多半是经济政策，并没有触动政治体制。尤其是邓小平所言“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仅仅提出，并未触及内里。

毛泽东用来搞文革，邓小平用来搞改革，用的同一个体制。它只是改变其运作方向，即使反向运行，也是带病运行，伴随有巨大隐患。尽管第一场改革提出了双重目标，第一经济体制改革，第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还出现过两次小高潮，1980年邓小平讲《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全文发表于人民日报头版头条；1986年催促要设立专门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机构，要提出草案、方案。他自己个人的论述，多次切入旧的政治体制的命脉，曾经说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在英国、美国、法国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那里有民主制度；曾经说我们要寻找到一个制度，这个制度使得好人上去做好事，坏人即使上去也不能做坏事；甚至说到他自己：一个党、一个民族千百万人把他们的荣枯兴衰命运维系于我一身，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但是经济体制改革改到一半，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目标，还没有触动就中断。八十年代邓小平论证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决定性，曾经深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这些说法已经消失。

1977年胡耀邦复出，做得最多，也是最得人心的丰功伟绩，是平反冤假错案。那时英姿焕发，说得最多也自信的，是“要把文革强加给我们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统统推倒”，十年后，1987年年初他走出那个“生活会”，竟然是仰天长叹：“文革阴魂不散！”

第二场改革：稳定压倒一切

1992年，第二场改革在前一场改革被打断的背景下，国内外发生一系列重大事件，经三年徘徊，重新启动。历史的天幕上还是有一行字，只是朱颜改，改为：“1989年的事情不能再发生了”！或可以干脆引用那几年叫得最响亮的一句震慑性口号：“稳定压倒一切”！背景巨变，决定第二场改革与第一场改革，仅仅是在“改革纪年”上字句相连，骨子里已经180度转向，貌合神离。

1989年下半年邓小平辞去所有职务，闭门不出。面对西方制裁、苏东崩溃、台湾解严、

党内批邓暗潮再起、改革失败、经济滑弱、民情冷漠之不利，邓内心如煮，不亚于文革时在南昌著名的邓小平小道上来回散步内心激烈的程度，他不改写历史，历史将改写他。1992年邓破门而出，踏上南巡之路，已经是垂暮之年，接近90岁，这是他政治生涯的第四次大起大落。正是此次南巡，结束三年徘徊，推动中国踏上第二场改革之路。第一场改革虽然是他掌舵，但受多方面牵制、拉扯，党内左派反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党内外右派要求他不仅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整个80年代，两种力量来回拉扯，众人皆云“单年自由化、双年反自由化”，阶段性拉锯，没有一年平息。92年第二场改革发动，北京政治风波阴霾下，右的声音一巴掌打了下去，鸦雀无声；党内左派声音由于自然老死规律，突然凋零，南巡之路，几乎成了邓小平晚年一次意外的独唱。

时间之窗再一次打开，留给邓小平的时间只有两年，两年后他将卧病不起。他抓住了生平最后一个时间之窗，抓住了此次“独唱”良机。他改变了第一场改革时期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期望、犹豫、急切、停步之反复摇摆，关闭这一阀门；以经济突围冲破政治困境，围“魏”救“赵”，以经济业绩补救政治合法性之流失；鼓动大干快上，“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威胁“谁不改革谁下台”；不惜拆除最后一道意识形态屏障——“不问姓社姓资”，甚至带头招商引资，在北京秘密设宴，延请台湾巨商王永庆来大陆投资，以此拉动外资潮回归。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的邓小平时代，其实就是这一时期降临的。中国并不是在第一场改革，而是在第二场改革，在他行将去世之前的两年，甚至去世之后，迎来了真正邓小平的时代。

1989年北京事变改变了邓小平改革的思路，也改变了中国改革的路径。正是在这一巨变背景下，执政者在经济层面号召加速改革，大干快上，而在政治体制、社会进步、思想文化等公共领域，则提出“稳定压倒一切”，并不顾忌这一提法烙有明显的反改革之嫌。即使在文革动荡年代，毛泽东为收拾乱局，也只是间断使用“团结”、“安定”等类似提法。只有军人出身的林彪集团，才会使用如此直白的提法：“政权，政权，政权就是镇压之权”。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正版文章，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9年下半年，邓小平与新一代党政领导江泽民谈话，说的是：“我们党有一个传统，那就是第一把手说话要算数，什么时候你说话算数，我就放心了。”两相比较，人们不难发现其间发生的惊人巨变。迄今为止，中国人尚未听说邓小平是否留有遗言，人们有理由将这段论述看成他为身后时代所留下的最为坦率的政治遗言。

第二场改革的动力：权力与资本的结合

应该承认，第二场改革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拔地而起，赶英超美，那是毛泽东时代就已提出的宏伟蓝图。毛用错误理念、错误方法赶英超美，曾使他的子民付出大跃进三年饿死三千万七百万人的惨痛代价。而真正实现赶英超美，则是在邓小平启动第二场改革，以及他去世之后的二十一世纪初年。92南巡之后，中国的改革思路收敛于经济一点，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甚至倒退；而经济改革单腿蹦跳，幅度、广度、深度却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1992年，“市场经济”喷薄而出，写进了这一年中共十四大政治报告；2001年为一劳永逸解决每逢“六四”敏感时节，美国国会纠缠最惠国待遇之政治困境，由政治高层出面干预，最终加入WTO；2007年中国GDP超过了英国，国民经济总规模达到了世界第四，2008年年底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实体。经济体制改革突飞猛进，迅速改变历史性积贫积弱的物质面貌。李鸿章去世前，曾洞见此后中国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这一变局，此后中国困于内外战乱，这一变局也多次半途而废；李鸿章去世一百年后，中国才真正进入这一变局。从物质层面而言，实现三千年之未有大变局的，正是当下这一代中国人亲身经历的当下三十年。

如此惊人的巨变，动力来自哪里？

第一场改革的动力来自文革压迫，来自开明派官员与知识分子结盟，来自底层农民求温饱、求致富的迫切愿望。改革有共识，也有愿景，改革的社会效果也是帕雷托正效应，人人都有改善。但在1989年之后，参与第一场改革的开明派官员大多被废黜或边缘化，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的声音遭到打压，农民则从改革的受益者成为“三农危机”的埋单者。第二场

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另外崛起的两股力量：政府和资本的结合。

中国政府的各级官员在第一场改革时期大多持观望游移、消极等待态度。但在第二场改革时，这一阶层在“招商引资”、“经营城市”的口号下迅速勃起，自我利益突然苏醒，他们从改革的被动者变成了主动阶层、甚至是冲动阶层。省、地、县各级官员最为关心的是“招商引资”，最有激情的是“经营城市”，以至于各级政府成了大型投资公司，相邻两省、两市之间成为两个大型投资公司的竞争关系，省委、市委书记成为董事长，省长、市长则成为总经理。考虑到中国各级政府都是所在地社会动员力、资源配置力的垄断者，驱策如此动力“下海”，其间伴随巨大的自我利益刺激，不消数年，世界历史上所有工业化、城市化快速记录自然就在中国被迅速刷新。

1989年北京事变后，海外资本曾掀起撤离浪潮，西方政府也对中国政府施行经济、政治制裁。邓小平说过一句狠话，“资本家资本家，我就不相信资本回来以后，资本家的政府不回来”。于是大幅度降低海外资本投资的门槛，“三减两免”，降至为零，享受民营企业难以享受的优惠特权；中国城乡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资源，而这些人力资源并无工会保护，无法维护起码的人权；两者相遇，中国立刻成为世界历史上罕见的“资本天堂”，没有一个具有经济理性的资本家能够抵御这一天堂的诱惑。经短暂撤离，海外资本终于回归，回浪扑来，浩浩荡荡，如入无人之境。2004年，笔者在欧洲访问，曾听到那里的人们如此抱怨：为什么欧洲的高税收、高福利搞不下去，要改革？原因之一，就来自于你们中国经济的崛起，给欧洲剩余资本找到了新的投资场所，在那里遭遇不到工会劳方的谈判抵制。

中国成为世界资本投资的天堂，各级政府官员面对资方是“招商引资”，面对劳方是“稳定压倒一切”。资本当然要回来，不仅回来，而且成为各级政府的座上宾。无论怎样的历史学家，都没有预见到世界历史会发生这样一场戏剧性幕：全世界的资本蜂拥而入，来拥抱全世界最后一个也是最大敌人——中国共产党。米老鼠有无数幅动画，但从来没有出现这样一幅黑色幽默：亿万只老鼠蜂拥而入，来拥抱地球上最后一个也是最为硕大的天敌——中国猫。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世界资本主义运动从来没有如此幸运，能把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两个力量结合起来，“权”与“钱”紧紧拥抱在一起！两部发动机叠加，不是两轮驱动，而是四轮驱动，前轮追逐利润，后轮输出稳定，逢山开路，遇水筑桥，所向无敌，如入无人之境。而在中国，确实是个具有无数人的“无人之境”——没有起码人权保护的资本天堂。在这里，权力与资本结合，不形成“权贵资本主义”是无法想象的，形成“权贵资本主义”才是第二场改革的正常逻辑。招商引资，“权”“钱”结合，能“经营”所有城市，能在十年内打造出一个外滩中国，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它的辉煌业绩，它的粗鄙贪婪，它所造成的经济奇迹与社会弊端联袂飞舞，则触目可见，随处可见。

第二场改革的根本秘密：From MarxLeninism to MarketLeninism

面对这场巨变及其前景，国际学术界提出过各种解释，积极者如“中国模式”，消极者如“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中性者如美国哥伦比亚政治学教授、中国通黎安友先生则提出“有韧性的威权主义”一说。³无论是“中国模式”，还是“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皆言之过早，“有韧性的威权主义”则因学术中立，似有逐渐流传之趋势。

这一说法揉合70年代东亚四小龙经济起飞与1989之后苏东阵营转向市场经济，似兼顾中国社会的儒家传统与中共建政的集权特征。主语“威权主义”，打通的是中国共产党与亚洲四小龙之间隔；定语“韧性”，打通的是这一政权虽在意识形态上坚拒苏东巨变，却又发展出市场经济这一更大区隔。但致命伤在于：东亚四小龙全是右翼政权、右翼意识形态，而中国的意识形态虽然发生大幅度萎缩，其左翼核心还在（政治体制、国家建制、官员任免机制），所谓“卷旗不缴枪”，旗是红的，枪是红的，与东亚四小龙的白旗、白枪，根本不是一回事，怎么能随便类比？

不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那是什么？笔者认为：第二场改革塑造了今日中国的政治，也塑造了今日中国的经济，更塑造了今日中国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这场转变是从马克思列宁

³ 黎安友：台湾清华大学中国当代研究中心讲演 2007年10月

主义演变而来，放弃马克思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市场经济置换马克思主义，捍卫列宁主义国家专权，逐渐形成的“中国特色”是“市场列宁主义”——“From MarxLeninism to MarketLeninism”。在市场经济经济基础之上，矗立着列宁主义上层建筑的庞然大物，后者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如有变化，变动的是它的体能，它的规模，在市场经济超额利润的滋养下，这个列宁主义上层建筑不仅没有萎缩，而是比三十年前发展得更庞大，更壮硕。1978年改革开始时，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总量3.2%，简政放权11年，1989年降至1.2%，1992年分税制改革以后，这一数据逐年爬升，2007年底终于恢复至3.2%。这是百分比，从绝对数量说，三十年后的3.2%岂止是三十年前的十倍、百倍？三十年前，改革时期第一代大学生毕业，若有进政府系统当官者，遭人鄙视；三十年后大学生择业，进政府当官成首选，公务员考试趋之若鹜，录取者为一，报考者上百，甚至出现更高数据。三十年改革走了一个V字型，这个V既是民众权利的恢复性生长，更是政治权利的无限扩张，既是市场经济的蓬勃扩展，更是列宁主义上层建筑的起死回生，甚至是辉煌胜利。

结语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中国没有总统，却有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比总统庞大百倍的列宁主义。形塑今日之中国者，第二场改革也，非第一场改革也，两场改革之间，有一条巨大断裂。三十年历史，所去未远，人心都有记忆。如果打闷包打统账，三十年一言以“蔽”之，无论“好”派、“屁”派，无论用第一场改革残留在民间的温馨回忆，来回避第二场改革的误区；还是用第二场改革的误区，来否定第一场改革曾经有过的另一种选择，都不能改变历史，都会在人心这杆秤上跌落下来。我们既应坦率承认已经变过来的市场经济，也应直面没有变化的上层建筑，更应该承认我们的改革成果是改出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的奇观：“市场经济”加“列宁主义”的庞然大物。我们确实是条龙，而且是腾飞的龙，但不是东亚第五龙，而是起死回生的红色巨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另一种社会形态。面对这一红色巨龙，此前所有能够解释现代化过程的社会学、政治学理论，无论是高唱赞歌的“中国模式”，还是气急败坏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抑或貌合神离的“有韧性的威权主义”，都在这一人类奇观前苍白无力，失去了解释能力。中国的知识界没有理论储备，西方的思想界同样没有思想准备，真正能解释这一人类奇观的理论尚待来者，尚待东、西方学者更为艰辛的努力。